

## 中文版序

本書原文版書名 (*A New Deal for China's Workers?*) 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近年來的發展是否預示著中國勞工也即將迎來他們的「新政」(New Deal) 時期？也就是說，與改革開放初期比較，中國現在的勞資關係變得更民主，同時也賦予勞工更多保障和權利嗎？就是這個問題促使我從2009年開始投入對中國的研究，也是這個問題讓我開始探索中國勞動現況的各個層面。本書完成的時候，答案已經逐漸明朗，尤其當我們看到近年來中國加強打壓獨立勞工運動人士，和其他推動公民社會的維權人士，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越來越清楚。2016年我在結論章寫道：「如果這個問題是在問中國工人是否有機會通過自主、自由選擇，並且民主的工會參與共同的自救行動和集體談判，那麼答案當然是『不可能』，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發生。」而近年來中國的政治風向讓這個答案更為明確。

不過，本書的主要論點時至今日仍舊值得探討。本書說到中國政府下定決心遏止獨立勞工組織興起，從許多處理勞動抗爭的策略皆可見一斑，這樣的決心也影響了勞動抗爭處理策略的各方面，包括實施有限的鎮壓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監管層面的改革行動。雖然鎮壓與改革雙管齊下的做法，以及改革的內容在近幾年都出現改變，但中國政府的核心目標仍是控制勞資衝突，避免集體的獨立勞工運動或組織崛起。

本書的重要目標，就是要讓西方讀者尤其是身在美國的讀者，更了解中國的勞動現況。然而，過去多年來我數次到中國進行研究並有機會與許多人對話，我才發現中國有很多人，或者說很多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對我的觀察和論點也感興趣，尤其想知道我這個美國人是怎麼看中國的。因此，我很高興本書能推出中文版，讓它有機會接觸到更多有興趣了解我的研究的中文讀者。

我要特別感謝喬仕彤教授，他過去任教於香港大學法學院，現在任教於杜克大學法學院，很感謝他鼓勵我並協助我在香港找到出版社出版此書。我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接下這項任務，以及感謝譯者陳佳瑜用心翻譯此書。2020到2021年對全球來說都是多事之秋，感恩他們的努力讓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在這麼艱困的時期問世。最後，我還要感謝很多很多人，他們都出現在原文序言裏的感謝名單。感恩有他們，才能有這本書。

辛西亞·艾斯特倫德 (Cynthia Estlund)

2021年4月

# 自序

我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埋首研究美國勞動就業法規，當我對這個領域已經熟悉到覺得有些索然無味，中國正好蹦出來對我招手。我擔任勞工律師並研究勞動狀況的幾十年間，中國一直位列惡名昭彰的「逐底競爭」最底層。就全球勞動標準來看，中國的狀況實在太糟糕：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宣稱自己奉行社會主義，但同時又廣邀全球資本家一起來剝削自己國家的貧窮勞工，勞工不只薪資低，還身處在似乎毫無法律監管的黑暗工廠裏。後來在2007年看到《紐約時報》的精彩報道後，我才知道中國的勞動狀況已經開始改變：中國政府頂著資方的反對聲浪頒布新法，試圖提升勞動標準並改善落實成效；官方工會也開始積極在各大工廠內組織工會；而勞工將勞動力短缺（中國居然也會勞動力短缺！）變成自己的籌碼，開始敢於大聲吶喊出自己的訴求。雖然這些消息聽起來很振奮人心，但還是顯得遙遠而模糊。

2009年夏天，我初次到訪中國，開始看到勞動狀況的更多層面，到處都充滿矛盾和驚奇。北京機場、上海天際線以及無處不在的高架起重機，都暗示著二十一世紀會是中國的世紀。我和多位中國學者曾一邊享用美食（和淡而無味的啤酒），一邊暢談政治，這和我之前以為在中國談論政治必須小心翼翼的情況完全不同。聽著他們說政府很拚命在處理各領域的大規模抗議，包括勞工、環境、土地徵收等

議題引發的抗爭，更激起了我研究中國的興趣，他們的敘述讓我看見了一個發展快速、一黨專制的國家在致力維穩的過程中面臨的種種為難之處。在研究中國勞動現況的路上，我看到勞動議題已成為中國政府極度關注的迫切議題（在美國，勞動議題早已失去曾經有過的重要地位），而且中國勞工有可能正站在勞動制度即將出現重大進展的轉捩點上，而中國勞動制度的進展也將對全世界造成影響。

那次參訪後我回到紐約大學，整個人興奮不已，覺得中國的勞動議題實在太吸引了，那時我第一次認識了我的同事孔傑榮 (Jerome A. Cohen)，他是亞美法研究所 (U.S.-Asia Law Institute, USALI) 所長，是非常傑出的朋友。他說我雖然是初步踏入中國勞動研究領域，但我在美國勞動法及勞動法沿革方面已經有幾十年研究、教學和著述的資歷，他認為我一定可以為中國勞動現況帶來獨特且重要的觀點，而且也堅持我一定要把握一切機會來做這件事。因此，這本書要獻給我這位好友，就是因為他的鼓勵和啟發，才讓我踏上了這段意外的學術旅程。

但孔傑榮給我的，不僅是鼓勵和啟發。他很高興我能加入他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的中國法律研究計劃，該計劃主要透過亞美法研究所進行。他及其在 USALI 的同事提供了非常棒的研究基礎，以及豐富的人脈，這是我在 2009 年 6 月首次在其辦公室與他會面後，就開始感受到了。在跟我解釋為什麼我正是他及其同事一直在等待的人時，孔傑榮提到有三個人一直在催促他開始一個勞動研究計劃。我剛巧分別跟這三個人都認識，正是這樣的機緣讓我不再多想，立即投入中國勞動的研究。

當時紐約大學的 2009 年法律畢業生高進仁 (Seth Gurgel)，剛搬到上海為 USALI 做研究，希望能更深入探索中國的勞動領域。他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他也是我的威斯康辛州同鄉），他在學時表現就十分優異，而且我後來發現他對中國研究非常熱衷，也非常有想法。從 2010 年我的初次研究參訪開始，以及接下來的很多次參訪都

是由他籌劃安排，並且陪同參與了幾十場訪談，他陪我見了許多知名勞動學者、律師、官員以及非政府組織活躍人士，足跡遍布北京、上海、深圳等六個內地城市，另外還有香港。高進仁在這些訪談不僅擔任翻譯，也用各種方式減少雙方在理解上的困難，還會利用空檔幫助我消化理解一波波的新知洪流。我們在早期合寫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有些部分後來演變成一本合著裏討論工會選舉的章節，有部分也成為本書的內容。<sup>1</sup>但後來高進仁希望自己能為中國帶來更多影響，因此自2013年起，他便和一群年輕的公益律師共事至今，他許多的夥伴也都在勞動領域中努力。

2009年孔傑榮與我初次會面提到的另外兩位，分別是何宜倫(Aaron Halegua)和阿諾·札克(Arnold Zack)。何宜倫當時剛從哈佛法學院畢業，是研究中國勞動法的年輕學者。200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時他上過我的課，還幫我安排了最早的一些非正式會面，讓我見到好幾位激起我對中國研究興趣的勞動專家。後來何宜倫仍一直不斷為我的研究提供非常寶貴的見解、資訊和中國勞動法領域的人脈，特別是勞工維權人士，包括律師、平民倡議者以及勞工的非政府組織。阿諾·札克則是孔傑榮過去在法學院的同窗，是十分知名的勞動仲裁員，在與孔傑榮會面之前我已經認識他很多年了。札克長期擔任勞動仲裁員，而且主張勞動仲裁員可以協助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標準，特別是在亞洲。後來我們還一起前往中國進行學術參訪，同行者有高進仁、孔傑榮還有我的同事山姆·艾斯徹(Sam Estreicher)，那次我們一起到中國研究勞資糾紛調解機制的擴展應用。

我後來真的一頭栽進了中國勞動現況的研究中，研究期間我到訪中國十幾次，出席許多重要會議，與中國的學者、律師、官員、維權人士進行數百場面談(美食佳釀通常有助於大家暢所欲言)。一開始是靠著孔傑榮提供大量支援，還有高進仁和何宜倫的大力協助，我才

逐漸建立起自己在中國勞動領域裏的人脈，認識一群長期關注中國勞動議題且非常有想法的觀察家。不過後來透過其他管道，我也認識了一些與共產黨友好的知識分子以及政策黨員幹部，這些人都挑戰了我對中國（和美國）原有的認知。很多討論都讓我更深刻了解中國勞工面臨的問題，以及中國獨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而過去我對這些領域的認識都只來自新聞媒體或學術界的書籍文章。另外，我還要感謝紐約大學的同事和研究助理，大力協助我理解許多中文參考資料（本人從2010年才開始學習中文，中文程度僅能進行簡單的寒暄、自我介紹和簡單生活會話，完全不足以應付學術研究或有深度的對談）。

我在勞動就業法領域從事研究、執業、教學和寫作近35年，而且幾乎都跟美國獨特的勞動就業法相關，這當然會深刻影響我對中國勞動現況的理解，也會影響許多讀者對中國的認知。但話說回來，我對中國的認識也讓我我不禁重新思考美國的勞動就業法和政治體制。我在本書試圖清楚表達「由美看中」和「由中看美」的雙向觀點，希望可以幫助與七年前的我有類似先入為主觀念的讀者從本書獲益更多。

先說明幾個小細節：首先，這本書第8章的早期版本曾刊登於《比較勞動法與政策期刊》（*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sup>2</sup> 第二，書中提到的中文姓名都依中文習慣將姓氏置於名字前方，但以下感謝名單裏的人名一律先名後姓，本書的注釋一樣出於統一格式，姓氏都擺到最後（但偶爾還是有例外，例如毛澤東）。

我有幸獲得許多人的協助，才能完成此書。不過很遺憾，有些接受訪談的中國朋友我無法透露其姓名（訪談大多保密進行，按雙方共同協議受訪人姓名不予披露）。此外，向我提供寶貴見解的朋友實在太多了，難以逐一列出所有人的名字，但我對每位都誠摯感謝（若書中有任何錯誤、不恰當的評論或誤解，責任都在我）。在這些前提之下，我要特別感謝Joel Andreas、Earl Brown、William Brown、Kai

Chang、Sean Cooney、Wenwen Ding、Baohua Dong、Sam Estreicher、Eli Friedman、Mary Gallagher、Dan Guttman、Xin He、Virginia Harper Ho、Sam Issacharoff、Junlu Jiang、Dimitri Kessler、Margaret Lewis、Ben Liebman、Cheng Liu、Mingwei Liu、Xiaonan Liu、Martin Ma、Carl Minzner、Pasquale Pasquino、Eva Pils、Jian Qiao、Benjamin Van Rooij、Bo Rothstein、Teemu Ruskola、Xiuyin Shi、Karla Simon、Frank Upham、Isabelle Wan、Kan Wang、Tianyu Wang、Zengyi Xie、Tian Yan、Arnold Zack、Wei Zhang、Weiwei Zhang、Wei Zhao及Earnest Changzheng Zhou。此外，我還要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兩位匿名審稿員，他們看完全書初稿後給予了非常精闢的評論；同時我也要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兩位編輯Michael Aronson及特別是Thomas LeBien，他們給予我很多支持和指導。<sup>\*</sup>

紐約大學的確是我進軍中國學術研究的絕佳平台，前後兩位學院院長Richard Revesz和Trevor Morrison都以許多形式提供協助。我在USALI過去與現在的同事也一路給予溫暖鼓勵，除了之前提到的孔傑榮、高進仁、何宜倫，我也要感謝Ira Belkin、Yu-jie Chen、Chaoyi Jiang、Ling Li、Chao Liu及Han Yu。此外，紐約大學還有許多人都為我的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協助，在此感謝Gabriel Ascher、Alvin Cheung、Iris Hsiao、Regina Hsu、Jesse Klinger、Bing Le、Rousang Li、Weili Li、Hannah McDermott、Yingying Wu、Jo Yizhou Xu、Wentao Yuan、Luping Zhang、Tianpu Zhang及Han Zhu，尤其要特別感謝Ellen Campbell的卓越貢獻。感謝兩位圖書館員Gretchen Feltes和Meredith Rossi在我研究過程中提供寶貴協助；也要感謝紐約大學法學院大力

---

<sup>\*</sup> 上述人名直接以英文原文呈現，但在正文章節則以音譯或明確中文姓名呈現。——譯注

贊助研究經費，部分經費透過 Filomen D'Agostino and Max E. Greenberg 研究基金會提供。

最後，我要深深感謝我的孩子，潔西卡 (Jessica) 和魯卡斯 (Lucas) 一直給我滿滿的愛和支持，他們倆都是善良、博愛、有趣且優秀的年輕人。當然還要感謝我的丈夫山繆·伊薩查洛夫 (Sam Issacharoff)，他是我很重要的同事，總是給予寶貴的建議與熱情的支持，在過去 35 年來以及未來很多年，都是我人生路上最美好的伴侶。

## 注釋

- 1 Cynthia L. Estlund and Seth Gurgel, "Will Labour Unrest Lead to More Democratic Trade Unions in China?," in *China and IL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ed. Roger Blanpain, Ulla Liukkonen, and Yifeng Chen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 2 Cynthia L. Estlund, "Will Workers Have a Voice in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Curious Revival of the Workers Congress System,"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36 (2014): 1.